

西北大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选



(七九级)

教务处编

一九八四年元月

目 录

在现实生活的立体交叉点上·····	(1)
从“辞”与“理”及其关系看李贺的诗歌创作·····	(10)
题材问题及其它·····	(21)
韩非教育思想浅析·····	(25)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试析·····	(34)
试论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	(43)
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51)
如何看待《资本论》中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关系·····	(6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English·····	(72)
CHARACTER OF JANE EYRE·····	(80)
一类拟线性椭圆型方程的有限元解法·····	(87)
“关于不定方程 $ax+by=c$ 的正解”一文的内容简介·····	(101)
From第二区分问题和Poincare型微分方程的极限环线·····	(104)
一类三阶参数曲线·····	(115)
微型机文件管理系统·····	(126)
利用中文打字机构成的汉字终端总体设计方案·····	(132)
用高林——小岛相对论方程处理重介子问题·····	(143)
分析用SKyrme力推导的微观光学势在重核区域的光学模型计算·····	(147)
无定型硒——硒——钨——钼系的吸收系数·····	(172)
离子型闪锌矿结构晶体的晶格振动谱·····	(178)
激光放大试验的分析·····	(188)
关于He——cb激光器的电热式补气系统的设计及实验研究·····	(194)
增感染料溶液性质的研究·····	(199)
双硫脲的极谱研究·····	(213)
四元体系 $Li_2O-MgO-B_2O_3-H_2O$ 在40℃时溶度的研究(部分工作)·····	(238)
氦分子离子的零级波函数·····	(243)
玉米粗油的综合利用·····	(259)
槽式搅拌反应器几何相似和流体力学的参数关系·····	(272)
糖醛生产中轻组份的回收利用·····	(291)
烯、炔类气体标准生成热估算·····	(296)
《CA-Ti复合药用低压超滤膜凝胶过程的研究》·····	(304)

以含高铁铝的浏阳磷矿制普钙防止有效磷后期退化的研究	(313)
活化碳酸钠溶液吸收二氧化碳的热力学数据测定	(323)
磁化水处理后番茄不同生育时期酯酶同工酶和可溶性蛋白的变化	(363)
伊贝母组织培养及根、芽分比	(370)
苏芸金杆菌溶原性菌株的分离鉴定	(378)
磁水灌溉对番茄植株抗病力的影响	(385)
西风酒大曲中细菌的分离和鉴定	(390)
汉中梁山寒武纪海绿石的成因	(397)
安徽凤阳小红山地区蓝闪石片岩及其地质意义初探	(401)
汉中狮子山砾岩的成因	(426)
应用微观孔隙模型研究束缚水的形成及其与非均质的关系	(436)
四川盆地结晶基底对油气的控制	(448)
小秦岭金矿带西段矿田构造特征及找矿方向探讨	(457)
宁强宽川铺组小壳动物群及震旦系——寒武系界线新认识	(470)
渭北旱塬东部典型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分析及生产潜力估算	(483)
关中之国土经济	(507)

在现实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

——评路遥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汉语言文学专业 王 荣

指 导 教 师 魏秀琴

在我国新时期文坛上，路遥这位青年作家，是凭着他的那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的。然而，在读者中间，文学批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却是他的那部中篇小说《人生》。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现实主义艺术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作者的名字，也就和他创造的艺术一起，被大家所熟悉。

如果单从作品的创作数量来看，路遥在新时期文学中的青年作家群中，可以说并不是一个产量高的作家。但是，当我们追寻着作者新时期的创作道路时，就清楚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他的这些不怎么多的中短篇小说中，却显示出一条明晰的现实主义轨迹，创造出了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艺术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的事就在于找出焦点并把它显示出来”。^①在路遥的小说艺术中，作者似乎寻找出了这样一个艺术表现的“焦点”——“立体交叉地带”。他说：“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值得去表现。我的作品多是写这一地带的”^②正是从这个新的表现角度中，作家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着激烈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的当代生活画面。

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路遥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立体交叉桥，几乎象征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十年动乱和动乱以后的调整改革，我国当代社会生活比之过去的年代是复杂多了；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③因为：“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④正是由于作者总是从一种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视野之内来认识生活现象，力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和思考，从而在对于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掌握中，表现和把握生活整体。因此，他笔下的农村生活，既不是那种经过净化了的田园牧歌，更不是那

种静止的、凝固的生活内容。而是充满着各种生活领域和社会阶层的信息，和整个社会机体发生共振的生活领域。在这里，你仿佛能够从中触摸到生活跳动的脉搏，透视到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存在之间不可避免的撞击。构成了“交叉地带”这种艺术特征，写出了对生活内容概括性更强的作品。

《不会做诗的人》这篇小说中，描写了在十年动乱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公社书记刘忠汉是一位踏踏实实，熟悉生产管理的农村领导干部。但由！他不会，也不愿意在“学习小靳庄”的赛诗会上做“诗”。就被“调离”到县城搞付食加工。在这种现实生活矛盾面前，这位党的干部并没有气馁，没有退缩，而是努力熟悉钻研业务，用自己的劳动，来抒写真正的诗篇。由于作者注意从现象和本质的内在联系上来描写，因而，就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在新生活面前》中，作者通过一个机械修配厂改建成机械修造厂的故事，表现出在经过十年动乱以后，我国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跃进。再现出了在现代化生产方式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冲击和推动下，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

作品的这种现实主义特色，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三部中篇小说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作者所描绘的“一九六七年纪事。”他把一个不太新鲜的题材放在十年动乱这样的社会背景上，通过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具体的动乱场面的描写并且敢于把艺术的笔触大胆地伸入到社会的底层，因而真实深刻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人民带来的灾难。写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以及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人生》这部中篇，更充分地体现出作者这种艺术的魅力。从高家林到小县城的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上，演出了一幕幕由现实生活矛盾而导致的悲剧故事。在这个“立体交叉地带”，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

那么，从这些表现出生活的本质内容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作者在进行自己的艺术探索和美学追求时，是把艺术的根须，深深地伸扎进传统生活的土壤之中的。正是从这种对于民族传统生活中美的发掘之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而写出了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和变化。

《在困难的日子里》，是作者描写“一九六一年纪事”的中篇小说。在这里，作者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生动地表现了在物质生活极度缺少的情况下，人的精神生活中闪现出的耀眼的光彩。在那个荒僻的山村里，“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的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来资助我，鼓励我不要中断学业。“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巍巍地塞到了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用枯瘦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千叮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正是这种来自于最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怀，使作品中的主人公“猛然间懂得了，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这样的生活真理。干部子女吴亚玲，为了帮助这个来自农村的同学，使他能够完成学业，用一种无私的精神给他以真诚的帮助和生活上的温暖。即使遭受别人的误解，甚至名誉上的非议时，也都没有动摇她的这种关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不正是来源于我们民族传统生活中吗？不正是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伸和发扬光大吗？在《人生》中的得顺老汉身上，更明显地显示出作者的这种审美倾向，表现出他对于我们民族精神中美的歌颂和赞美。这位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无配老汉，“爱得身边每一个娃娃。

有一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满筐转着给娃娃手里塞。”这种淳朴的品质，不仅表现在这种生活上的关心、爱护，而更重要的，则是他对于青年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导和帮助。在他那些朴实的话语中，潜透着丰富的生活哲理。“我虽然没有妻室儿女，但觉得活着总还是有意思的。我闹过好，也痛过苦过；我用这两只手劳动过，种过五谷，栽过树，修过路……这些难道不也是活得有意思吗？——拿你们年轻人的词叫幸福。幸福！你小子还不知道，我把我树上的果子摘了给村里的娃娃们，我心里可有多幸福！我栽下一棵树，心里就想，我死了，后世人在那树上摘着吃果子，他们就会说，这是以前村里光棍老汉德顺栽下的。”他支持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他在高加林志得意满的时候，教诲他“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地啊。”要求他“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啊”。而在他跌倒的时候，对于前途失望的时候，又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引导。“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这种对于生活的崇高理解和实践，充分地表现出中华民族淳朴、善良、宽厚、忍辱负重、富于自我牺牲、踏实苦干的美德。也流露出作者对于传统生活深沉的热爱和发现。

但是，我以为，如果作者仅仅把他的艺术的触角停滞在这里，那就显然是不够的。别林斯基说：“每个时代的诗的不朽都要靠那个时代的理想的重要性以及表现那个时代历史生活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活得最长久的艺术作品都是能把那个时代中最真实的、最实在、最足以显出特征的东西，用最完满最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①所以，一个作家如果真正是现实主义的，那么，在他的作品中，就应该是在挖掘传统生活美的同时，揭示出历史给生活带来的新因素。写出生活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中的具体的思想精神状态。这不仅使作品的内容富有时代气息，也是构成民族化艺术的基本因素。在路遥新时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和探索。

《月下》这篇小说中，作者给我们描述了一对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村后瞎眼寡妇的独苗大牛，是一个固守在传统生活中的农村青年。他的外表上是“象牛犊子一样健壮，长得笨头笨脑，平时只会干活，二拳头也打不出一句利索话来的小伙子”。他的现代文化知识可以说和他的体魄成反比，“刚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工分本子上的数码。”但在他的心里，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心里偷偷地爱上了书记的女儿兰兰”。他的这种爱情，表现为一种传统的纯真的爱。他“只是希望永远能看见她在他眼前存在着”。因为他也知道，兰兰是一个有文化的好姑娘，和他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这样，既使“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也要沐浴在她那温暖的光辉之下啊。”因而，在兰兰高中毕业回到农村以后，他们之间也曾建立了纯洁的友情，有过那样温馨的回忆。然而，生活毕竟进入到了八十年代。“兰兰要出嫁了。”她将要嫁给城里那个开汽车的青年，走向新的生活天地。生活的变化击碎了这个鲁莽的农村青年心里的梦幻。因而，当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他举起石头，砸向那辆迎娶兰兰的汽车时，就不只是看到这个农村青年的失望和痛苦，也感受到了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搏动。

《风雪腊梅》中的故事，则揭示了生活中的另一种新的因素。作品中的冯玉琴，是一位长得漂亮，然而生活在一个穷僻的小山村的姑娘。她和康庄从小一起长大，一同上学到高中毕业。在共同的生活里，建立了真挚的爱情。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在“一块出山

劳动，一块谈天说地”中，感到“生活有一种说不出的甜味”。因此当她被地区招待所吴所长挑到地区招待所做服务员时，她并没有感到优裕的物质生活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在“整天的白米白面，肉上肉下”中，感到精神上的枯竭，“觉得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不痛快”。现代生活的介入，使他们的心灵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出现了一种不平衡，一种分裂。所以，她不愿意用自己最珍贵的爱情去换取所谓的物质享受，而是希望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过一种实在的、充实的生活。但在这种社会现实矛盾中，康庄却走向了反面，他为了离开他认为是“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吃上炊事员这样“一碗公家的饭”，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和冯玉琴的爱情，成为一个在物质生活冲击下的畸形物。作者敏感地抓住了当代社会生活中新的因素，写出了由于这种新因素的注入，而引起的生活内容的变化，特别是给青年人带来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从路遥新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就是：由于作者敢于正视现实生活，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因而能够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勇敢地介入生活，观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变化。这样，就使作品中的生活故事，深深地扎根在民族传统生活的土壤之中，使作者自己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思考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结合起来，而不是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渲染某种主观情绪，使作品的内容玄空，软弱，不着边际。这一点，是特别需要作家的真诚、热情、敏锐和有见识的。正是如此，才使作者不仅真实地反映出了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而且表现出了对于这块土地的深深地热爱以及对它的新的认识。在这里，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与感情的纠葛，交织在一起；美与丑，爱与恨和甜与苦，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复杂的社会生活。使我们不只是从农村，而是从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矛盾交叉中，认识到了我们当代社会的本质真实。

孕育出复杂的人物性格

恩格斯说：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典型人物“是—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⑥恩格斯的这段话，指出了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性格和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批评了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说：“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的环境，也许就不那么典型了。”即是说，哈克奈斯没有能够揭示出那个时代和人物性格中的内在的本质联系。

路遥笔下出现最多的，也是最能给读者以思考和启迪的，是一些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闷和烦恼的青年形象。这些青年，大都是具有着一定文化程度，受过现代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但又生活在一个束缚着自己愿望发展的狭小的环境之中。他们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和理想，而且表现得是那样的认真、挚着；但是又无法摆脱现实生活关系或传统的束缚，人物的命运总是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因而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这种由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孕育出的复杂性格，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中。

高加林的性格，是“交叉地带”的产物。他的确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集多种矛盾的性格于一身的完整的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画廊中出现的

一个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普通的、然而却是有才华的农村知识青年，一个在现实社会中积极探索人生道路，但又缺少正确思想指导的农村青年形象。他向往一种新的生活道路，并对此有着一股执拗地追求精神。因为，在学校中接受的现代文化教育，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城市生活给他打开另一个更为绚丽多彩的世界的窗口，他喜欢谈论国际问题。”这样，他必然地向往着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干的社会环境，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现实却使他只能生活在一个保留着古老、落后习俗的山村里。虽然他也曾“十几年拚命读书，说是为了不象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但最终也只能回到这块土地上来耕种。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个人愿望和生活实际的冲突，加之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势力而增大了，激化了。由于“走后门”的原因，他的民办教师职位也被挤掉了。纯真的爱情，使他对土地产生了新的感情。但“卫生革命”引起的风波，又使他重新陷入抑郁和苦闷之中。落后势力的强大，象一瓢水一样，浇灭了那刚刚燃起的对土地的热情，重新泛起他对于人生的另一种渴求。一个偶然的时机，使他成为一名县委的通讯干事。而他也以自己的才干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由于组织上对“走后门”的纠正，又使他再次回到了土地上。在人生的道路上，又转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从他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实的生活画面：一个有才能，可以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被别的有权势的人通过“合法手续”从教师队伍中除名，而他靠“后门”走进了“县委大院”，又被“纪律检查委员会”除名。在这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是一致的。

同样，在高加林的性格中，又表现出内在的复杂因素。在他那貌似强者的内心里，却是一个软弱的、不稳定的自我。他有的是愿望本身，而缺少把这种愿望变成现实的真正动力。因而，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缺少在逆境中改变现实的勇气。自信和自卑彼此排斥而又紧密地胶合在一起，成为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悲剧性危机。而这种自卑感来自于他对土地感情上的疏远和对旧势力的退却。作品中的土地象征着生他养他的亲人，象征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疏远了对土地的感情，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免疫力，失去了生命的根，从而也就难以确立一种坚定的生活原则。

对爱情的态度，也表现出复杂的内容。一方面，高加林并不是张弦《银杏树》中的“姚敏生”，他同传统的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刘巧珍的爱情是相当真诚的。但当他由于偶然的机遇，使命运出现转机之后，个人主义的排它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人生的含义终于被曲解了。“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最终把来自外部亲人的忠告和舆论的责难以及来自内部的良心发现全部否定了。但是，在我们感到痛惜、愤懑、谴责的背后，我们又不能不这样想，假若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始终不改变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假若刘巧珍这样诚挚的爱情仅能够唤起，而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的生活哲学又怎么能够说服他且不使他和“土地”的疏远呢？

高加林的形象，显示出了当代农村生活中的某种必然性。反映出在这个历史时期，传统的东西已经容纳不下这一代青年人对人生的追求和愿望。但他们又往往不太理解通往新生活的曲折的道路，因而表现为欲望大于现实，把人生的意义仅局限于个人愿望的实现上。这样，在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就表现为只是一种要求，而不是更多的给予。所以，

当他们从满足个人的愿望出发来研究生活，探索人生道路时，就难免走上弯路。

在刘巧珍的复杂性格中，表现出我们民族在现状中呈现出的二重心理状态。这就是感奋着时代的变化却又时时被旧道德、旧观念所束缚的精神的发展。在这复杂的心灵结构中，充分表现了农村青年在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愿望。由此反映出在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个有着“金了般的心”的农村姑娘，“虽未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在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里，闪烁着我们民族精神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善良、纯朴、谦让等等。在她对高加林深沉的爱情中，蕴含着传统爱情的理想和对现代精神生活追求的多种因素。然而也正是由于传统精神中的糟粕，又限制了她的精神的发展。使她不能对自己的价值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因而“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并且把这种差距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在爱情的追求上，实质上是一种乞求。“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俩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的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她不是通过他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只是希望由他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偏狭的认识取代了她的全部自然意识。这样，在爱情上就表现为缺少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而是始终把自己放在依赖的地位上。特别是最后的爱情结局，是被她当做生活原则来接受的。这种自我反省后的认识更加深了她性格的复杂性。使我们看到她在精神上显得是那么富有又那么贫困，那样善良而又渗杂着愚昧，谦让又伴随着自卑，纯真却又未免简单。而她那种没有嫉妒，没有报复的忍让精神，爱情上的自我牺牲精神，又引起了我们心灵上、感情上的震动，让人难以忘怀。

所以说，现实主义艺术在探索人物心灵的奥秘，塑造人物性格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地、具体地表现和揭示新旧交替时期人物内心世界的层面上，而还应着力表现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涌现出的新型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

由于作者较准确地把握了当前农村生活的种种矛盾，把人物置身于城乡“交叉”的位置上，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充分展开人物性格，因而揭示出了促使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写出了复杂而丰富的人物性格。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也表现在对其它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是一位淳朴、勤劳，又安天知命的老农民。“一辈子不相信别的，只相信命运”。他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着传统农民的心理因素，又带有生活矛盾赋予的时代因素，并表现为性格上的矛盾状态。他在儿子的民办教师被“下了”时，并不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的支配，而是一方面感到气愤不平，老泪纵横，向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表示自己的抗议。另一方面，却教诲儿子，“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并且要求加林他妈“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因为“说来说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哩！”从这个人物的矛盾性格中，我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也真实地写出了这个生活在八十年代的老农形象。

对于高明楼这个人物的性格，作者也没有简单化，概念化。在他身上，既有着农村基层干部的“土皇上”气魄。“这多年，村里大人娃娃谁不尊他怕他”。因而，他在农村不招工的情况下，“走后门”挤掉了高加林，让自己的儿子教书。但同时，作者又写出了他

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挤掉高加林以后，他并非是心安理得，而是感到内心的不安。他也看到高加林是一个人才。他支持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关系，表现出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思想水平。特别是他首先喝了半马勺“净化过的凉水”，平息了那场“卫生革命”引起的风波。所以，从这个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性格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处于变革时期的当代农村生活。

正是由于作者塑造出了这些处于“交叉地带”的复杂性格，揭示出了人物性格中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所以，使人物个性突出，性格丰满。广泛深刻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复杂面貌和矛盾冲突。

在悲剧性格和命运的背后

在路遥新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不仅复杂的现实生活孕育出了复杂的性格，而且这种复杂的性格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在这些悲剧性格和命运的人物形象背后，我们发现了主宰着这种悲剧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是古希腊悲剧中神的预言，也不是象自然主义作品中那种生物性、遗传性，而是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所产生的一种物质的力量。正是它主宰了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作品。作者并没有用那种庸俗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描写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糊弄读者，而是透过爱情这个人与人最自然的关系，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必然的矛盾冲突。因而就使这种建立在生活逻辑之上的爱情故事常常表现为一种悲剧性的结局。

《姐姐》这篇小说所叙述的爱情故事，是那么美好，那样地动人，但在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结局却又必然地表现为一种悲剧结局。“姐姐”小杏是一个温柔、善良、纯洁的农村姑娘。她在“那个省里来插队的知识青年”高立民，因为父母的问题，遭受人们的歧视时，用最纯朴的善良去关心这个“特务的儿子”。也正是这种无私的感情把这两颗年青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患难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是崇高的，珍贵的。并且这种建立在互爱基础上的婚姻，既是符合道德的，也是符合人们理想的。然而，作品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就在于，他并没有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变化发展主观化，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的样子，揭示出了支配着他们爱情命运的社会力量。在悲剧性的结局中，使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产生了理性的思索。作品中，当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高立民父母平反了，高立民也考上了大学。生活的变化，造成了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你是个农民，我们将来无法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和职业，商品粮和农村粮之间存在的现实差别。”这些，最终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所以，尽管高立民“从感情上说”，是爱着小杏的，但在现实的矛盾面前，他表现为“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痛苦”，而最后则“实际上屈服了另一个我自己”。在矛盾的冲突中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格和命运。从作品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和命运中，我们看到了隐藏于他们背后的力量，正是它，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卢卡契曾经说过：“大团圆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结尾，这种结尾没有真正的信念，没有明确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能够从个别的和典型的情况中真正有机地产生出来的。我们又

学中的公式主义的巨大错误，不管它的理由是多么充分，就在于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文学从正确的乐观主义引到一种陈腐的、没落的‘大团圆乐观主义’中去。”（悲剧性的结局，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之上的。它深刻地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冲突。所以说：“无辜的灾难只是悲惨的而不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不幸是无理性的”。（黑格尔语））而悲剧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给人的是一种崇高壮美的感受，从而能使我们从中认识到“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认识到那些将要被历史扬弃的负担。

《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爱情悲剧，由于揭示出了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它和那种“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劝世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意义。它引起我们感情上激荡的，不只是对于“痴情女子”的同情悲悯，对于“负心汉”的道德谴责和批判，而给予我们感受的、分辨的、思考的，是更新颖更复杂的问题。它并不是单纯地从爱情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这场爱情悲剧的，而是汇聚了比起个人道德因素更多的现实社会矛盾因素。

我们知道，在高加林的性格发展中，他是把自己的爱情紧紧地和自己的人生道路结合在一起。并且，他和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不但是社会现实矛盾的产物，而且这种爱情的发展变化最终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表现为一种物质的力量。作品中高加林和黄亚萍还在高中读书时，就因为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理想追求，开始萌发出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这种自然的感情交往，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实际生活把他们划在农村和城市这“两个世界”之后，也就象早晨的雾一样，很快地消失了。当然，在高加林的心里，开始也“总是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就好像丢失了一件贵重的东西，而且没指望再找回来了。”在黄亚萍心里，“分别初，也时不时想起他，有时甚至很想念他”，但在现实生活的面前，他们都没有能够超越过去，编织他们爱情的梦幻。而是“这一切都渐渐淡漠了。”所以，当高加林成为县委的通讯干事，生活、命运使他们走在同样的世界时，他们的爱情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东西了。尤其是高加林在“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时，就更加促成了他和刘巧珍的离异，和黄亚萍爱情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高加林“当然想和黄亚萍结合在一起。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在这里，他们从志趣相投的同学到情投意合的恋人，如果从理想的爱情、婚姻来看，无疑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生长在天国里，而是生活在“立体交叉地带”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因而，当高加林被退回农村，又一次成为农民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也就“是不可能了”，最后，终于咬咬牙割断了这种爱情关系。在这个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里，我们得到的是透过人物悲剧命运的背后，而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和思索。

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关系，也是一种悲剧的结局。就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来说，好象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而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所以，他们的爱情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内在因素。因而，当高加林成为一个农民时，“巧珍的美丽和善良，多情和温柔，无私的、全身心的爱，曾最初唤醒了他潜伏的青春萌动；点燃了他身上的爱情火焰。”使他在农村的生活中，尽管有其它苦恼，但在感情生活上却是富有的和充实的。然而，对于生活的并不全然相同的看法，不同的人生追求和

向往，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发展趋向。所以，当高加林靠“走后门”到了“县委大院”以后，他们的爱情就“已经远远不如过去在庄稼地里那样令人陶醉了”。并且听到巧珍的话，也感到乏味，“心里不免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纹。虽然这时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护还是忠诚的，一无反顾的。但是，她的这种痴情却得不到对方的回报。特别是当高加林把爱情和前途联系在一起看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悲剧就成为无法逃脱的结果了。从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中，我们看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被遗弃者的内在的悲剧因素。因而，使这种爱情悲剧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爱情自身，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总之，在路遥的作品中，作者好象总是在有意识地摆脱那种庸俗的所谓“理想主义”。而是从人物的性格出发，按照生活的必然逻辑，表现出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些悲剧性的爱情描写中，作者不仅揭示出了人物悲剧性格的内在的社会原因。而最根本的，是让我们发现了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社会物质力量。由此，使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

在路遥新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作者描写了处于变革时期农村和城市这个“交叉地带”的生活画面，塑造出了生活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的人物性格，表现出他们的愿望和理想，揭示出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对那些青年形象复杂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真实描写中，反映出他们对生活、社会的再认识、再思索的过程，以及处在这种新旧交替时期的动摇、彷徨和探求，发现了支配他们命运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样，作家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提示：经受过痛苦磨难和教训的青年，不仅应当从“伤痕”中坚强地走出来，而且应当站在现实的土地上，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创造性。而不能只是单纯地向社会索取什么。虽然，主宰着人们命运的那种物质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并且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不公正的。但是，只要我们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那么，就会有着不竭的精神力量，就能够产生坚强的信念，也就可以而且能够战胜和改变命运，在改造现实和创造生活的斗争中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来。

注：

- ①《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76页
- ②《文艺报》一九八二年第二十二期
- ③④《面对新的生活》见《中篇小说选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 ⑤《别林斯基全集》第七卷214页
-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98页
- ⑦《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山东师范学院编
- ⑧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303页

从“辞”与“理”及其关系 看李贺的诗歌创作

汉语言文学专业 李 浩

指 导 教 师 房日晰

引 言

诗国唐代的丽空，一颗慧星扫过冰凉的天庭，带着灼热耀眼的白光，在人们仰视着的天顶划出一道波纹状轨迹，随即就消失了。

燃烧完热能，释放出了光。星，殒落了，静悄悄，一片荒凉的沉寂。

然而议论蜂起：爱护他的，为他排众议、辟邪说，写出天壤间维持公道 的文章^①；嫉妒谤骂他的，却将他的诗稿投于溷厕之中；顶礼膜拜他的，要把他放到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神龛之中^②，或附会到象牙塔、白玉楼上；责难他的，则又把他目为“鬼才”，扣上唯美主义的帽子。

二十七岁就夭折了的没代王孙、落魄公子李贺竟如“UFO（飞碟）之谜”一样，引起古今异代诗人和评论家的争辩、非难、礼拜。或涂脂饰粉，或毁誉参半，或贬而又贬。

究竟孰是孰非呢？

首先，让我们就历代对李贺的评论作一简要的回顾。

李贺死后不久，受他的友人沈子明的委托，杜牧给李贺诗写了一篇叙，对诗人的身世遭际、创作情况、艺术风格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后世论及李贺，大多以此叙为根据，或将其中的观点生发展开。但有两处却引起许多争论，更确切地说，后人对李贺诗歌评价的分歧主要围绕着杜牧的那两句话。

杜牧首先用一连串比喻形象地描述李贺诗歌的色泽、情态、风格、意趣和他读李贺诗所引起的心理上的自觉表象活动、联想和想象。然后，笔锋一转，评述李诗的“得失短长”：“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又引世人之言，感叹地说：“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后人对李贺的争论，打笔墨官司，作翻案文章，或稍警，或肤浅；或严肃，或荒唐，或充满戏剧性，大都在杜牧“辞”与“理”的界说、内涵上立论作文章：

《北梦瑣言》：“予尝览李贺歌篇，慕其逸才奇险，虽然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③

刘须溪曰：“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王琦对这段活加的按语则反唇相讥：“乃谓贺所长在理外，是何等语耶？……而自附于长言之知己，谬矣。”^④

李维桢则把矛头直接对准杜牧：“杜樊川谓骚之苗裔，令未死，且加以理，可奴仆命骚。未为不知长吉，亦未为深知长吉。诗有别才，不必尽出于理。”^⑥

对于具体篇章，也有人挑剔，元人丁石认为《金铜仙人辞汉歌》“辞未能达意”，因此作了一首《续金铜仙人辞汉歌》，但后人又刻薄地讽刺他烦词累句，画蛇添足。

自称是李贺异代知己的姚文燮却把李贺抬得很高，“以贺诗为唐春秋”，对杜牧的话别出心裁地进行了巧妙的诠释：“贺理不及骚而为骚之苗裔也，是不必以骚抑贺也；又谓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也，是又不必以贺抑骚，骚理何必皆贺，贺理何必皆骚？”^⑦

今人的论述，将前人的“辞”和“理”、“文”和“意”更通俗地表述为形式和内容、表现和思想，多在肯定李贺浪漫主义风格之后，在文章的尾巴附缀一句：内容和形式不统一，内容单薄，而形式华美幽艳。

对于唐代诗国丽空上出现的这个“UFO”，对于上引各种议论，我们持什么态度呢？李贺诗的辞与理、形式和内容是否统一，是在什么情况下统一，又在什么意义上不统一？以下，根据已见作一些探讨。

一、从中唐社会氛围、时代精神看李贺诗风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政治经济的转折点，盛唐、中唐之分不仅是编年史的分界，而且是时代风尚、美学趣味变化的标志，站在盛唐的时代之巅上瞻前望后作一次历史性眺望的话，真可谓“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天宝年间承平日久，统治者安于逸乐，荒淫腐化，诛求无厌，已埋下了战乱的隐患。宦官阉党专权，藩镇恃强割据；豪门贵戚，连云甲宅，冠盖辉赫。开边拓土，滥用武力，边庭流血成海水；朝野百姓，怨声载道，哭声直上干云霄。混战八年之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东都之地，宫室焚烧，中间畿内，并邑榛棘。与开元全盛日相比，多么令人心寒惊悚！宪宗初期，倒也励精图治，知人而任，先后起用杜黄裳、裴度、李绛等精明正直之人为宰相，委派高崇文为东川节度使，李愬为唐邓节度使，陆续平定了四川叛军刘辟和淮西已寇吴元济，一时声威大振，出现转机迹象，形成了一个短暂的中兴局面。但晚年迷信方士，宠任太监吐突承璀，又以江湖术士柳泌为台州刺史，最后吞服金丹得病，死于宦官陈弘志之手，在他暴崩的前两年，李贺也抑郁去世。

急遽变化的时局，混乱不堪的现实，皇帝的求仙致寿，驱吏大臣的骄奢放荡，玉工宫娃的泣血哀吟，黄洞群众的起义反抗，在李贺作品中都有反映。（如《荣华乐》、《雁门太守行》、《吕将军歌》、《老夫采玉歌》、《官娃歌》、《感讽·合浦无明珠》、《黄家洞》、《贵主征行乐》等等）

由于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中兴局面，给人们带来过一线希望，反映在李贺诗中也有积极进取的一束亮光、一组强音：“少年心事当拿云”（《致酒行》）、“二十男儿那刺促”（《浩歌》）、“男儿屈穷志不穷”（《野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其五），甚至想到“世上英雄本无主”（《浩歌》）、“朝沟堍出，看取拂云飞”（《马诗》十五），昂扬悲壮，金戈铁马，颇有燕赵慷慨之士的流风余韵，在全诗中陡然振起，如幽暗的洞穴射进一缕光明，乐曲的低音区突然击响了几个高音键子。

无奈好景不长，象当时政局由瞬间的光明，很快又回复到黑暗浑沌之中一样，李诗也蒙上了一层忧愤怅惘的色调：“只今迫已紧”（《赠陈商》），“甘作藏雾豹”（《春归昌谷》），“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泉卢”（《赠陈商》），最后发出了“狭行无靡路，壮士徒轻躁”（《春归昌谷》）的浩叹！

对我们来说，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精神生产、艺术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对客观外物的刺激所作的回答。正如泰纳《艺术哲学》所总结的：“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神为比例的。”

但是，这种反映和决定不是那样简单和直接，它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现实的阳光，必须穿越多层次的大气层，才能最后照射到艺术家心里。更明确地说，决定艺术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生活，而是由诸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作用于艺术家。按恩格斯所说，“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①

就李贺诗来说，绝大部分并不是和社会生活有同态对应关系，与史事一一对座入号；并不是现实的模写和翻版，而是生活的变形，感受的熔铸，情感领域的开拓。展现出的是另一个风云变幻、江浪淘沙的空间——诗人广袤无垠的情感世界、幽深的心灵冥府。陈沆特别是姚文燮，不理解这一点，所以在对李贺诗作了创造性的解释后，终不免坐实附会，陷入以“唐春秋”而论的魔障里。

如果说，社会经济在元和、贞元时期还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迹象，有一定程度恢复的话，而中唐的社会心理、时代氛围却一直在一种可怖的阴影翳蔽笼罩中，虽时浓时淡，但一直没有晴朗。对已逝去的盛唐大业的追念凭吊，对党争、藩镇、宦官的恐惧，对灰色人生的失望，对建功立业的冷漠。于是怀古、恋昔、悲今成了中晚唐艺术作品的最泛主题，伤感家国身世是准基调。一种世纪末的情绪弥漫在唐人的心理中。闻一多认为元和、长庆时代已是“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②，就时代精神的把握而言，无疑是准确的。作为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意绪情思的凝聚的诗歌，自然也会随着发生变异。

就美学风格说，“这里没有李白、张旭那种天马行空式的飘逸飘动，甚至也缺乏杜甫、颜真卿那种忠挚刚健的骨力气势。他们不乏潇洒风流，却总开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与盛唐边塞诗比，这一点便十分清楚而突出，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避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③李泽厚先生这段兼有哲理和抒情的精彩论述，给我们勾勒出了整个中晚唐诗歌的轮廓，只有把李贺放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的环境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精神和美学趣味的氛围中，才能对他诗歌的特异性，辞与理的错综关系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二、扭曲心理的外化

象其他一些具有天赋的才子一样，少年李贺性聪早慧，才高志洁，心雄好胜。但或许是遗传，或许是后天的什么原因，使他质羸体弱，落落寡合，交往少，社会适应性极差，

对家庭特别是母亲有一种特殊的依恋感。独处幽居，尚友古人，含英咀华，使他一直在书本里过生活，较少涉足染尘于现实；昌谷明媚的自然风光又陶冶了他的灵秀之心，培养了他异常丰富的感受能力和遐思冥想。作为唐宗室的后裔，他具有门第清华高贵的荣誉感，但作为丧失贵族特权的王孙，又使他感到不幸，敏感的自尊与现实的清寒贫贱，造成了他内心的第一组矛盾。父亲早逝，家境中衰，作为李姓的长子，又迫使他过早地告别了天真无邪的童年，出来支撑门户竟祖业，同时还想实现他天真稚气的幻想。生活的重负过早地压在了这双瘦弱的肩上，他的心灵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对于皇族贵戚的子弟，通过应举求仕，已属下策，但可悲的是，被褫夺了考试权利，连当时唯一有可能获得官爵，报效国家，奉亲养家的道路也给堵塞了。

金色的和粉红色的幻想被撕破，一腔热血被冷凝，敏感、自尊、好胜的心被践踏扭曲。他原想变高鸟，栖碧梧，友凤凰，附冥鸿，如箭排空，遨游八极，泛览人寰，然而还没有飞出盈尺间，就摔下来了，折了翅膀。斥鷃幸灾乐祸，蓬雀冷嘲热讽……；他原想带吴钩，提玉龙，踏清秋，腰斩胡虏，收取关山五十州，画像存功凌烟阁，然而终以奉礼郎的卑职，臣妾气态，屈身承鼎。

仕进是唐人生活的一个重大主题（陈寅恪语）。李贺在仕途的第一步就摔了跤、受了打击，并且这打击又不是某个人赤裸裸干的，而是一伙狰狞的奸佞小人，蒙着封建礼教的面纱，用貌似合理的借口，狠狠打了他一闷头棍。他想寻衅，又找不到证据，他也许怀疑过这礼教的合理性，但要他批判和抨击，又没有勇气，况且也没有清晰透彻地认识到根源。他只是凭直觉感到周围空气的浊臭、沉重，象铅块一样向他压来。他经常作梦，有天仙、玉女、何麻姑、苏小小，但更多的是树魅山魈，嗷嗷鬼叫，幽幽磷火，凄凄夜雨，秋风撕着纸钱，古墓中发出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声……世纪末思潮，黑暗的投影，心理上的恐怖与精神上的苦闷，作用于这个体弱多病，涉世未深的青年，于是造成了他的病态心理和分裂性性格。他的许多引人争论，使人费解、幽峭孤深的作品，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这种性格的外化。

为什么李贺的一些作品晦涩、说理不透呢？他年令和阅历的制约性与规定性告诉我们，李贺没有，也不可能把一切看穿，他苦闷矛盾、徘徊不前，对生的否定，对死的憧憬，而又终不敢去死；粪土权门，淡泊利禄，而又始终惦记着功名仕进；对醒醒人世的生理性厌恶，对仙游出世的欣慕企求，而又终不忍抛妻别母，忘怀人世。比较而言，他既没有李白那样豁达宽阔的胸襟，凡事能娱酒消愁，自求解脱；也没有杜甫那种“江流石不转”的不拔毅力，忍辱负重，不论穷达皆以天下为己任；甚至还没有稍晚于他的杜牧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自赏。他对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许多可愕、可怪的事永远不能理解，终生不能解脱。思想的暧昧是作品内容晦涩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也正如姚文燮、陈沆等屡屡指出的，为了远祸防谗，情不敢言，又不能无言，只能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借古题写时事，“寓今托古，比物征事，刺当世之隐，销铄壮士之怀，苟不韬晦，必至焚身”^⑩。

二十岁是人生多么富有诱惑力的时代，白日放歌，青春作伴，消度着锦片也似的韶光。它往往使老年人忌妒和追念，使年青人流连忘返，沉溺于其中，时时感到有自信自傲

的资本。二十岁时，李白正在匡山读书，结交蜀中道士宾客，鸿儒宿匠，口若悬河，阔论高谈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雄心壮志，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前，还对故多人物踌躇满志地说：“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②；二十岁时的杜甫，正快意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游历。高傲的头只向天空看着，“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他还没有真正开始细察体恤民情呢。

而我们的李贺在二十岁时，却骑着疲驴，迎着衰飒的秋风、打着旋儿飘落的红叶，行走在洛阳——长安的驿道上，为仕进，为生活奔波。请君看他给自己描绘的这一幅幅寒酸可怜的自画像：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开愁歌》）

并且头发已花白了，秋风中，明镜前一根根脱落：“终军未乘传，颠子鬓先老。”（《春归昌谷》）“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伤心行》），“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苍少”（《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诟是南山期。”（《咏怀》其二）面对着镜中的少年老翁，他几乎不敢相信就是自己，苦笑一声，强咽下忧愤，而牵动的情绪却是揪心割肠般的疼痛。《马诗二十三首》比物征事，以马喻人，那些瘦骨敲铜声、快走踏清秋的天驹龙骧、赤兔神骓，不被人识，不为世用，以致于“饥卧骨查牙，粗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发断锯长麻”。这是瘦骨突露、困顿摧折的马的写真，也是坎坷失意的人的象征。

按理说，李贺有生之年，正是青春勃发茂盛时期，他应该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类意气风发的华章丽句，然而他的大多数作品却不是青春的颂歌，不是生命的交响乐，更绝少对统治者的膜拜礼赞，而是猿啼鹃泣，树死花残，红衰翠减，老鸦木魅，一股愁苦悲凉之气迎面扑来，一组组奇特的意象迭加并列，“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含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谈艺》）。

时代的规定，情绪的压抑，性格的扭曲，心理的变态，变态的外化和表现就形成了他的诗风，形成了他作品“辞”与“理”的特殊关系。

李贺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仅仅是怀疑而已。巨大的世界之谜，人类命运之谜，未来生活之谜，归宿之谜，灵与肉的冲突和矛盾，这些深奥的、使古今多少睿智的哲人都望而生畏的命题，却迫使这个天真的少年去思考。《昆仑使者》中的“元气茫茫收不得”说出天人之际无干涉处（王夫之），《苦昼短》用“天问”笔法，对“月寒日暖，来煎人寿”的严酷而又不可抗拒的现实，对古今求仙致寿的举动，提出了一连串的诘问质疑。

外的否定往往与内的追求相联系。对宇宙人生反思的另一面，就是对自我在众生坐标轴上位置的确定，对个人存在的哲学相对论的探求。朱自清《李贺年谱》引洪为法云：“贺惟畏死，不同于众，时复道及死，不能去怀；然又厌苦人世，故复常作天上想。”啊，李贺竟是这样一个双重矛盾的性格！一方面，他对在外的帝王神仙是那样蔑视，“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荣华乐》），“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劫灰飞尽古今平”（《秦王饮酒》），“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诚为愚”（《箜篌引》）。瞧他多么超然旷达，无是无非，仿佛亲历了几千年天地之间、人神之际的沧桑巨变，把一切都看穿了，慢悠悠地讲出了这些哲理禅机；另一方面，